

薛永应

张德霖

李晓帆·著

生产力经济论



人民教育出版社

生产力经济论

薛永应 张德霖 李晓帆·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魏海源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力经济论/薛永应等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10

ISBN 7-01-002236-4

I. 生…

II. 薛…

III. 生产力经济学

IV. F0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48(号)

生产力经济论

SHENGCHANLI JINGJI LUN

薛永应 张德霖 李晓帆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字数:323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 7-01-002236-4/F·510 定价:17.50 元

引 言

第 1 节 时代频频呼唤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兴起了一门理论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引起整个经济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并被赞誉为“富民兴邦的智囊科学、高瞻远瞩的战略科学、析质计量的精密科学”,原因就在于它响应了时代的呼唤,是新质生产力的素描。

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从两个方面观察。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继手工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之后,一种具有新质的社会生产力,即信息生产力已经诞生并迅速发展。这种生产力以科学生产力为主体、为主导、为特征,因而有高度的科学性;是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因而有强烈的系统性;以精密的和自动化的、高容量和高速度的信息装置为基本的调控手段,因而有敏锐的可控性。在这种全新的生产力面前,我们原有的知识不够用了,许多也变得不适应了。另一方面,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正在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摸索和试验。

总之,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在向自己的更高阶段登越,在这转折关头,居于指导地位的理论就不能不实行相应的转变。

一、吃堑长智,谨防再误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实践的需要所推动的。生产力经济学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推动下,经过将近 20 年的酝酿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顾名思义,生产力经

济学是关于“生产力经济”的学问。此外所谓“经济”有两层涵义。其一，指生产力的“经济”方面，即如何认识和组织生产力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方面、“哲学”方面等等相对照。其二是如何取得生产力“经济”，诸如“结构经济”、“规模经济”之类，与“浪费”、“高耗”、“高投入、低产出”等等相对立。在我国，人们从多次的失误中吃够了苦头，深深感到不研究生产力经济学，单凭一门关于生产关系的学问，“半部《论语》治天下”，是绝对行不通的了。

回顾解放以后 30 多年可以发现，我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正确的部分，也有很多失误。失误在于：

第一，违背生产力结构有机化规律，把重点发展的方针绝对化。生产力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诸要素、诸子系统之间以特有的方式联系起来，形成互相提供生产条件、互相进行实物补偿的“投入产出链”。在生产力系统中，不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任何生产力系统都有其特殊的主导因素和薄弱环节，它们构成发展的重点。但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把发展重点凝固化和绝对化，一成不变地把重工业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农业忽视了，把轻工业、建筑业、运输业也忽视了。在重工业中，又把搞钢铁工业绝对化，使煤炭、化工、电力等部门没有得到协调的发展。农业上搞“以粮为纲”，扫掉了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破坏了生态平衡，使农业生产力系统的内部结构和环境条件严重恶化。

第二，违背生产力规模合理化规律，几度陷入不是“好大”就是“爱小”的盲目性之中。例如，50 年代末的小钢厂、小煤矿、小机械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遍地开花”，以及 70 年代后期的小糖厂、小烟厂、小酒厂、小棉纺厂、小针织厂“遍地开花”。须知，企业规模与成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工业化时期，企业发展的客观趋势是大型化，“五小工业遍地开花”直接违反这一规律。“好大”的例子也不缺乏，某些特大型钢铁企业弄得国家资金、运力都很紧张，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盲目性。

第三,违背生产力布局“趋优分布规律”和“由宏而微”的布局程序,提出所谓“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错误指导方针和“靠山、分散、进洞”的错误选址原则。结果使人们不但不能享受“社会分工之树”的果实,反而遭受各种“大而全”、“小而全”的损害。此外,地域有大小,布局程序应该是先宏观,次中观,后微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证宏观效益。可是实际工作往往是搞“先微观后宏观”的“逆行布局”或“有微观无宏观”的“单棋布局”。

第四,违背生产力因素时间组合有序化规律,错误地提倡“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基建程序,缺少基础设施与制造设施之间、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物质资料生产与劳动力再生产之间的宏观时序政策,以及各部门、各地区内部各种生产条件之间配合协调的中观时序政策。

吃一堑,长一智。当前大多数决策者和领导人都已认识到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重要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而且还要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在这个新时期的新任务面前,如果不研究生产力规律这个新课题,那么,担负着领导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各级领导者就不能正确决策,国家就不能振兴,人民就不能致富。

二、 必须把生产力发展战略建立在科学的理论上

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面告诉了我们许多东西,但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有一套科学的生产力经济政策,以及由这些政策配套组成的生产力发展战略。

首先要有科学的结构政策。生产力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劳动力结构、产品结构等等。只有制定一整套包括上述结构在内的科学的结构政策,才能使生产力的构成和发展协调顺利,适合于社会的需要。其次要有科学的规模政策。规模政策的精髓在于,通过对企业规模的选择和控制,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益。再是要有科学的布局政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必定有某种差别,为要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就非有一套宏观

的和科学的生产力布局政策不可。最后是要有科学的时序政策。现代化的大生产,秩序性强烈,时效性显著,变化节奏快,没有关于时序的概念和政策是不可能予以合理组织的。

科学的生产力经济政策之极端重要性,已如上述。然而,零散而不配套的生产力经济政策,虽配套而未形成完整战略的单系列生产力经济政策,也仍然不能充分发挥生产力经济政策的应有功能。我国也曾经制定过许多生产力经济政策,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误了。失误的深层原因正是缺少一个科学的生产力发展战略,特别是缺少指导我们制定和实施生产力发展战略的经济理论——生产力经济学。

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战略,至少必须包括发展目标的确定,发展方式的选择,以及几个基本领域的战略决策和几个重要侧面的大政方针的制定。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两者规律的生产力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就成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的两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回顾走过的路程,不难发现,我们的失误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失误,而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又根源于对生产力规律的“昏昏然”和对生产关系的“贸贸然”。昏昏然就不可能不做蠢事,贸贸然就不可能不搞冒进。怎样避免历史重演?最切实的办法是从自己的失误中总结经验教训。过去我们多次做过总结,但总爱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做文章,诸如“穷过渡”(生产关系上的急于变革)、“大锅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铁饭碗”(劳动制度上的僵化做法)、“独一处”(国营经济的独家垄断)和“大一统”(管理体制上的过度集权)等等。真正属于生产力方面的,语焉不详,也不深刻。有教训而不能总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生产力本身的构成和运动还没有从根本上深刻理解。

第2节 新星冉冉升起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奠定了基础

在时代的频频呼唤下，一颗新星冉冉升起。生产力经济学就是这颗新星。

生产力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学问，是科学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生产力观”，就是人们对生产力的看法。生产力是怎样的，就怎样看和怎样说，这就是科学的生产力观。生产力有多少本质内容，就说多少本质内容，这就是完整的生产力观。当然，“完整”只能相对而言。小小一个原子核尚且无限可分，区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还万世不竭，偌大一个生产力系统你能“明察秋毫之末”！？

生产力是各具特质的生产力因素在特定的关联方式和数量配比下，在适当的空间和时间内形成的，能够创造特殊使用价值或提供特种劳务的有机总体。对这样复杂的系统，必须有一门专门的学问去研究。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进行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生产力理论的话，那么，由后继者们根据他们的指导思想创立的生产力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代”生产力理论。

生产力理论的萌芽和发展，至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系统、深刻和科学地阐述生产力的理论，却是从马克思开始的。(1)马克思阐发了生产力是一个系统的思想。他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等。(2)马克思在不同的层次上确立了生产力的要素。第一层次是劳动过程的三个简单要素，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第二层次是科学技术。第三层次是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特别是分工协作。(3)马克思研究了生产力诸因素

及其总体的发展动态和阶段性。例如，他具体细致地研究了生产工具的发展史，科学地划分了机器的三个组成部分，研究了动力（能源）的逐步演进，研究了劳动方式的变化，研究了生产力的历史阶段。（4）马克思研究了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社会因素对生产力的影响。（5）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同使用价值、同财富、同价值的本质联系。（6）马克思阐述了合理组织生产力的一些基本途径，如两大部类的协调比例，社会再生产的价值运动与实物补偿必须协调一致的基本原理。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丰富而深刻的，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只对科学的生产力观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和奠基性的论述，并没有穷尽生产力观的全部基本内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我们后辈人的肩上。

在我们能够设想的限度内，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生产力理论至少应该补充下列内容：

第一，在对古今中外的生产力系统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更概括更精辟地表述生产力范畴的本质规定性，其核心就是对生产力下定义。过去，人们曾给生产力下过一些定义，但都过于笼统。

第二，以发达的现代生产力为背景，建立起能够解释一切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构成状况的生产力因素论和生产力系统论。

第三，通过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的研究，建立起符合实际的“生产力规律论”、“生产力环境论”、“生产力成长论”、“生产力流动论”等等。

第四，在对现实中的生产力进行研究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的生产力及其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进行研究，在观念上建立起符合历史真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生产力学说史”。这两史的建立是对常规生产力理论的补充和证实。马克思常常也是用历史叙述来补充和证实逻辑体系和范畴体系的。一部真实的生产力发展史和一部科学的生产力学说史，必将从事实的轨迹和思维的轨迹上，把生产力理论推到更加完整和科学的高度。

以上,显然只是被我们尖锐地感觉到了的部分。一旦生产力经济学在上述各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理论体系基本成熟,生产力经济学就可能继政治经济学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组成部分。

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补充了养分

系统的和科学的生产力理论固然是由马克思奠基,并在其后的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然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的生产力理论,也不是旷野上的“飞来峰”。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李嘉图、斯密、魁奈以至配第和色诺芬,它的理论营养也来自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有关生产力的各种理论^①。

(一) 酝酿时期

在手工工具生产力阶段,由于生产力要素比较简单,组合方式也不复杂,因此不可能产生系统的的生产力理论,最多只有一些关于生产力的零星的解释。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力理论的酝酿时期。

重农学派的魁奈(1694—1774年)是值得首先提到的人物。他之重要倒不在于他强调了人是财富的第一个创造性因素,而在于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力”的概念。他说:“和庞大的军队会把土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更高的发挥。”^②

生活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时代末期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年),强调分工的生产力属性,以及分工在生产中的作用。可以说,斯密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建立在分工这块基石上。他突破了重农学派把生产力范畴局限在农业上的框框,考察了包括农业和工业在内的一般生产力,并率先把分工这种非实体性的东西也看成是生产力因素,甚至看成是最强大的生产力因素。

① 以下关于魁奈、斯密、李嘉图、李斯特的论述吸收了熊映梧、王慎之、王师勤、王恺等同志的研究成果。

② 魁奈:《谷物论》,载《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9页。

李嘉图(1772—1823年)是活跃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侧面考察了生产力,例如“资本的生产力”、“土地的生产力”等,扩大了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生产力因素上,由于时代的推动,他特别推崇生产手段(尤其是机器)的作用。

萨伊(1767—1832年)在19世纪最初的十多年里,提出了生产三要素理论。他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都是“协同进行生产”,“创造产品所不可缺少的因素”。萨伊不仅继续肯定了分工因素,而且分析了生产力的三个实体性因素(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强调了它们的基础作用。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1783—1850年)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功绩是在生产力理论体系上开辟了第一个分支领域——生产力布局理论。1826年,杜能出版了《孤立国》一书,提出了农业区位理论。在他的启发下,韦伯(1868—1958年)提出了工业区位论,廖施提出了运输区位论。从此以后,这个分支领域就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区位经济学或空间经济学。

历史学派的先驱,德国的李斯特(1789—1846年),是生产力理论酝酿时期最出色地推进了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关于生产力的许多观点是极有价值的。他批评斯密等“流行经济学派”“没有能认识到生产力与单纯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对于前者没有能在脱离后者的情况下单独地加以考察,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理论下的一个附属因素”来对待^①。他认为,“要解释经济现象,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虑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②这确实是精辟的见解。在李斯特留下的思想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生产力多因素论”。李斯特除了承认前人一再指出的分工因素以及三个实体性因素之外,独到地指出了科学、教育等生产力因素。这一点,一方面固然是他所处时代的由第一次产业革命进一步完善的普通机器体系生产力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确实也表现了

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1页。

② 同上书,第122页。

李斯特的卓越见地。其次,李斯特鉴于古典学派的缺点,对生产力的性质进行了较多的探讨。他触及了生产力的总体性^①,强调了生产力的平衡性或曰数量规定性^②,指出了生产力的继承性、扩散性、阶段性等等^③。他的这些观点,可以认为是一种朦胧的生产力系统论思想。

(二) 发展时期

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保持了他们的先辈的良好传统,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他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这是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生产力理论,不仅在内容上大有扩张,而且在深度和方法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举要如下:

(1)各种经济增长理论。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到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从托夫勒的“三次浪潮”到奈斯比特的“十大趋势”,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到“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方法”,无一不是对生产力发展状态的客观描述。这些,都是我们用得着的。

(2)各种产业结构理论。从科林·克拉克以来,关于三次产业变化趋势的分析,无疑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性,因而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学者也有许多长处,或是方法,或是资料,或是结论。

(3)各种规模经济理论。从约翰·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到萨缪尔森的“收益递减规律”,从许多经济学家关于规模经济的源泉的分析,到他们关于规模经济的数学模型的建立,如果把它们的庸俗性、辩护性存而不论,那么可以认为,它们确实反映了生产力因素数量组合方式发展变化的某些规律性。

(4)各种生产布局理论。例如,他们在微观布局理论上就比较细致,发展了不少有用的工具和方法,如运费结构分析、指向性理论、等差费用曲线等。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从他们的生产力理论中吸取养料。正如牛

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249—251页、第100和111页、第155页。

顿形容他自己的成就时所说,他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才比别人看得远些。新兴的生产力经济学,一方面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是借鉴资产阶级生产力理论的产物,是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生产力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

三、现代方法论科学改换了生产力经济学的视角和方法

(一) 换了视角

生产力经济学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还应归功于视角的转换。生产力经济学在研究视角上作了两个调整,一是从“纯因素观”转向了“大系统观”,二是从“纯技术观”转向了“大经济观”。“纯因素观”停滞在对生产力因素的分析上,忽视对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分析。“纯技术观”把生产力看成“非经济范畴”。“大系统观”和“大经济观”则突破了这些框框,既不轻视对生产力系统的构成因素的研究,又特重视对因素组合方式的考察,既否定生产力的技术特点,又特重视生产力的经济属性。合而言之,就是“站在社会经济系统的高度和角度看待生产力系统”。

在新的视角下,“生产力”范畴具有多重内涵。

“生产力”这个概念,口语和文献中早就有了,但作为范畴加以规定,却只有不长的历史。“范畴”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概念指明某一事物的存在或映象;范畴则揭示该事物的本质和内涵,确定此一事物与他一事物的联系和区别。范畴是概念的深化和升华,是概念所指事物的理论抽象。在这个理解下,生产力范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它具有一系列内在规定性,例如物质性、运动性、功能性、整体性、联系性、开放性、经济性、社会性等。

在新的视角下,生产力范畴是经济范畴。

生产力因素本身,作为具有特定的物理、化学等等属性的单纯的自然物质存在时,例如作为机器或棉花存在时,它们不是生产力因素,从而也不是经济范畴,这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一旦它们在一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结合起来,特别是同劳动力结合起来,成为生产力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后,它们就穿上了经济的外衣,就成为生产

力因素,从而就都是经济范畴了。这一点,类似于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分析。马克思说:“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①“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② 在我们以上的分析里,这件“外衣”,这个“灵魂”,就是生产力因素的“社会结合”。

在新的视角下,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这三大学科中的“生产力”范畴,虽然同时被承认为社会经济范畴,但它们之间也有重要差别。

作为哲学范畴的生产力,是被当作社会历史的终极原因来考察的,它被定义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生产力,考察的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因此,对生产力本身,只考察其基本要素即可。在这里,它被定义为人与生产工具的总和。而生产力经济学就不能这样简单地对待生产力,它必须考察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组合方式、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运行机制和优化对策等等。这就意味着,作为生产力经济学范畴的生产力,应该有更深刻、更详尽的定义^③。

在新的视角下,生产力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的系统。

生产力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刚性的机械体,而是一个柔性的、活生生的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有机体,它的系统界线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和游移性。换句话说,生产力系统原本是内在统一的,它之所以被分解为一个又一个的因素和一个又一个的子系统,仅仅是由于认识过程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6页。

②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4页。

③ 有的学者提出了“反生产力”范畴。它的积极意义是显然的。然而,所谓“反生产力因素”,不过是生产力系统中的某些内耗因素或生产力环境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如懒惰、失误、人际冲突、自然灾害之类,这些因素大多不具备实体,其出现没有规律性,其构成没有确定的组合关系。总之,它与生产力系统中那些具有一定序列、在一定层次上存在、具有确定的实体或关系、包含着客观规律性的生产力因素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反生产力因素”这一范畴是不能成立的。

而不是由于事物本性如此。相反,生产力系统同任何有机事物一样,其组成部分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存在泾渭分明、不可逾越的鸿沟,整个生产力系统也没有凝固不变的边界。

在新的视角下,对生产力范畴自然就有了辩证的理解。这集中表现在3个方面:

(1)“实潜之辨”

生产力到底是一种“现实力量”,还是一种“潜在能力”?这关系到因素分析的一些重要结论。“二因素论”建基于“潜在能力”,“三因素论”则建基于“现实力量”。我们认为,“现实力量”与“潜在能力”没有根本区别。因为,生产力总是运动中的生产力,生产力运动是永恒不断之流;着眼于已经完成的上一轮运动,它是一种“力量”,一种“现实力量”,着眼于即将进行的下一轮运动,它是一种“能力”,一种“潜在能力”。对于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来说,二者在质态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别,但在量态上,由于受环境因素等等的影晌则可能有或大或小的差别。这一论点,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根本性质,即继承性的基础上的。

(2)“力率之辨”

在我们看来,“生产力”与“生产率”大同小异,是同一事物在两个视角下的不同映象:生产率从数量、效益、效率的角度看问题,表现为单位时间内或单位消耗上的生产力,生产力从品质、属性、构成上看问题,表现为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生产率是“个量上的生产力”,生产力是“总量上的生产率”,二者都是社会生产力的刻度和标志,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的“年轮”。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事物存在的一般规律,即质与量的统一这一规律的基础上的。

从世界范围看,生产力理论有两大流派——东方的“生产力”理论与西方的“生产率”理论。这两大流派正在相互接近:东方的“质态生产力”理论正向西方的“量态生产率”理论学习,愈来愈重视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上分析、论证生产力的数量表现及其

内涵,并用多种数学手段描述和刻画生产力(计算生产率),西方同行也正从东方同行的成果中吸取营养,愈来愈把生产率看成是由若干要素形成的合力,并同信息、教育、管理、战略、甚至多种上层建筑因素紧密联系。这样就形成了“生产力理论计量化”与“生产率理论析质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正是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率的“大同小异性”。

(3)“生非之辨”

指政治经济学与生产力经济学这两门学科中的“生产性范畴”与“非生产性范畴”的辨析。众所周知,财富是由自然与人力这两个系列的因素造成的。这就意味着,以“使用价值的生产”为主线的生产力经济学对“生产性”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以“价值的生产”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中,只有创造价值的因素才具有生产性,而在生产力经济学中,凡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创造使用价值的因素,都具有生产性。两个系列的生产性,既有重合,又有区别。

(二) 改了方法

自然科学史和政治经济学史都表明,方法论对于一个学科的科学性和历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汲取营养并脱颖而出,成为光照千秋的一门科学,除了别的重要原因之外,就是因为马克思发现并使用了崭新的、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是研究方法与论述方法的理论概括,是具体方法与世界观的辩证统一。所谓研究方法,就是形成一种学说的途径和程序,而论述方法,则是研究方法的表现形式,是把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构建为一个逻辑整体时所呈现的思维层次和步骤^①。

研究方法是存在着客观的层次性的:最高层次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间层次的方法是系统法;基础层次的方法

^① 此观点得益于刘永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史》第2页。

是抽象法和量化法等等。过去东方学者单纯用最高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去研究生产力,故只能得出一些既抽象又笼统的结论;西方学者则单纯运用最低层次的量化法,结果也陷入片面性——没有理论前提,没有普遍性品格。

我们除了主张兼用最高层次和基础层次的方法外,更强调中间层次的“一般系统法”或称“一般系统论”。

一般系统论,如果从奥地利生物学家罗伯特·冯·贝塔朗菲的学说算起,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这种系统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是对客观世界的深化了的和正确的认识。因此,它被许多学科引进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系统论认为,只有存在着相互作用、“整体”不等于“部分”的对象,才能称为系统。相反,那些虽然由许多“部分”所组成、但相互没有发生作用、“整体”也就是“部分”的事物,例如一堆未砌的砖,不能称为系统。系统论特别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主导地位和决定作用。“部分”形成“整体”以后,就扬弃了“部分质”,相应地,“整体”分解成“部分”以后,也就否定了“整体质”。这些,正是生产力经济学用以考察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生产力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还是它遇到并引进了近半个世纪来大大发展了的唯物辩证法,即“一般系统论”,并使它成为自己的基本方法。与此同时,抽象思维法和定量分析法也被置于重要地位。生产力经济学正是综合运用了“最高”、“中间”、“基础”三个层次上的科学方法去考察社会生产力,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

总而言之,正是这些历史契机,包括世界上第三代生产力的出现,我国经济发展中曾经遭受的挫折,现代科学中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老三论以及协同论、突变论、耗散论等新三论的问世等,加上我国经济学界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借鉴,一门新的经济学科——生产力经济学就应运而生了。

本书就是尝试构建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的一部论稿。